

學人話題

馬敘倫與沈鈞儒

劉立三

北伐時有聲教育界

沈鈞儒與馬敘倫均為浙江人，也都主持過浙江省教育行政，國民革命軍北伐底定江南後，兩人都曾擔任浙江省省府委員。民國十六年國民黨清黨，馬敘倫蓄意獨攬省政，誣指代主席褚輔成和秘書長沈鈞儒等與共黨勾結，褚、沈因而遭到拘捕。事後，褚輔成心灰意冷，決心退出政壇，於是面報當時的北伐軍總司令蔣公中正，願意從事百年樹人的教育工作，以報效國家；沈鈞儒也從此不再參加實際政治活動了。

馬敘倫從浙江省府委員調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，任職兩年，民國十八年離職，也不再參加實際政治活動，他同沈鈞儒一樣的從事教育事業；沈鈞儒當時擔任私立上海法學院教務長，馬敘倫到北京大學教書。兩人表面上顯得十分沉寂，而內心却無法忘情於政治，這個階段兩人經常與政府唱反調。民國二十五年，沈鈞儒利用人民的反日情緒，在上海發起「各界救國聯合會」，六月一日發表「成立宣言」及「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」，一時聲勢浩大；他們主要的目的是發

動學生罷課請願，騷擾破壞國民政府抗日準備工作。

民國二十六年春，沈鈞儒和章乃器、沙千里、王造時、李公樸、鄒韜奮、史良等七人被捕，這就是當時的所謂「七君子案」，造成政府不少困擾。在北平的馬敘倫也不甘寂寞，在民國二十五年與白鵬飛、許德珩、張申府、尚伊衣等，發動幾所學校組織「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國會」，馬敘倫任主席，白鵬飛出任副主席。這時，上海的「救國聯合會」推馬良（相伯）為精神上的領導人。

馬敘倫自己的記述：「北方的朋友戲稱：『南北救國，唯馬首是瞻』。」可知其沾沾自喜之態。馬敘倫為求表現，曾譏諷他的老友時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：「校長是政府任命的，所以要『仰承意旨』。」他也譏諷時任文學院院長的胡適：「胡適是主張好人政府的，現在這些好人已『登龍門』了。」馬敘倫對政府及其老友所造成的困擾，全然不放在心上。抗日戰起，民國二十六年秋政府播遷武漢，中央聘沈鈞儒為國民參政員，他受左傾人士煽動利用，還自鳴得意左右逢源

。這時，馬敘倫從北平到了上海，潛居於租界，有一天碰到陳公博，陳是馬敘倫在北大教過的學生，馬勸阻陳公博勿參加偽組織，馬敘倫說：「公博！我們讀書人氣節還是重要的；在節骨眼上，不可不顧到民族大義，要不然將來對不起自己，也對不起國家，豈可不慎重從事！」陳公博十分嚴肅的答道：「老師！你放心，我會特別慎重的，我決不會對不起自己，更不會對不起國家民族。」可是後來陳公博還是參加了汪偽政權，出任閣員，末了落得漢奸臭名，這是政治慾望、功利思想害了陳公博，利令智昏。民國三十七年冬平津變色，沈鈞儒以「民主同盟副主席」身份，馬敘倫以「中國民主促進會理事」名義，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邀請，從香港飛到北平，出任「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任委員」、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」等空頭名銜的職位，過着行屍走肉，毫無自由意志的生活，就這樣結束了他們的一生。

馬敘倫先是誣陷沈鈞儒勾結共黨，使沈鈞儒遭到牢獄之災，馬敘倫到最後也受到共黨利用，甘心投靠，真是一大諷刺。

鼓動學潮剛戾粗暴

民國三十五年八月，沈鈞儒隨褚輔成由上海回到原籍嘉興——沈有自知之明，知道獨自回家不會有人歡迎，所以攀龍附鳳，隨褚輔成而行。嘉興各界首先在銀星戲院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，中午，地方名士范古農在精嚴寺請吃素齋。他們是清末同赴日本留學的同學，褚輔成學警政，沈鈞儒習法政，范古農研理化；回國後范出任嘉興府學堂監督，也曾約請褚、沈二人到校授課，所以三人算是老朋友了。在精嚴寺用齋飯時，一位後生問沈鈞儒：「衡老（沈鈞儒號衡山）是否也暫借民豐紙廠（因褚輔成已決定暫住民豐紙廠）？在嘉興停留多久？」沈鈞儒微笑道：「我離開老家姚家坪已二、三十年了，這次回來，我要住在老家。」他略停頓，手摸鬍鬚調侃着說：「你別看我的鬍子這樣長，但我在姚家坪的輩份倒是很低呢。……」姚家坪沈府是所普通人家住宅，沒有附近蓮花橋錢府的氣派；然而因沈府在清代科甲不絕，多出任清高的「提學使」一職，因之近百年來，歷史上有兩位名人即出自「姚家坪沈府」的門下。

馬敘倫與沈鈞儒

一、林則徐（諡文忠）的房師為嘉興沈維鏞（字鼎甫），據「工部左侍郎顯考鼎甫府君年譜」載：「得士循如玉等十三人，侯官林官保則徐與焉。」沈維鏞在嘉慶、道光年間曾任湖北、福建、安徽等省學政，光緒年間退休，治遼、金、元史及西北輿地聞名於世，極為日本學人推崇的沈曾植是他的孫子。

二、于右任，光緒二十五年己亥，沈衛（漢泉）督學關中，時于右任在宏道書院肄業，甚受沈器重，視為得意弟子；當時陝西連年乾旱，遍地哀鴻，沈衛在江浙籌募鉅款，創設粥廠，指調于右任出任廠長。第二年小麥成熟時，結束粥廠，普將餘糧分贈饑民。之後，沈衛保送于右任入陝西中學堂肄業，所以于右任對沈衛執弟子禮甚恭。沈衛是沈鈞儒的叔父，沈鈞儒就出生在這樣的書香世家。

沈鈞儒生於清同治十二年癸酉（公元一八七三年），畢業於日本東京法政學堂，留日期間，參加了同盟會，回國後清廷賜同進士出身，即所謂的洋翰林，任法部主事。宣統元年（公元一九〇九年）九月初一日，浙江省諮議局成立，沈鈞儒被推為副議長，議長為陳黻宸，陳曾任廣東方言學堂監督，惜因其溫州方言太重，所以有關宣讀報告事項，統由沈鈞儒包辦，因之增其風光。沈鈞儒和楊度曾於清末發起「憲政公會」，總會設於北京，在東京、湖北、浙江等地均設有分會，其宗旨主張君主立憲，聲勢日張，影響甚巨；此時革命波瀾洶湧，清廷乃宣佈嚴禁結社，「憲政公會」會務隨即宣告停頓。

武昌起義，浙江光復，諮議局居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浙江第一張安民布告，就是出自沈鈞儒的手筆。待浙江都督府成立，沈鈞儒出任了教育司長。杭州省教育會成立，章炳麟和他分別擔任正、副會長。民國五年元月袁世凱稱帝，浙江宣佈獨立，並於四月十四日都督府成立大會時，選出參議二十六人，沈鈞儒和蔡元培都當選

了參議。也許受到以往他和籌安會主角楊度合組「憲政公會」的影響，或是如同日本作家田原順次郎形容他的個性「剛戾粗暴」，他總是和各方面落落寡合。

民國六年他膺選了護法國會的參議員，赴廣東參與護法。民國十二年曹錕賄賂國會議員，沈鈞儒和同寅王正廷、董振時等不受收買利誘，隨同眾議員南方領袖褚輔成離京南下到了廣州，表現獨立的人格。在南方，沈內心非常苦悶，因為他認為自己未受到應得的重視，所以自感孤軍單敵。

甘作中共的馬前卒

民國十六年，沈鈞儒受馬敘倫以「勾結共黨」誣告而被排斥脫離政壇後，寓居上海；盱衡國內外形勢，認為世界將逐漸步入真正民主之途。這時他也看出上海經濟地位的重要，他除出任私立上海法學院教務長外，並執行律師業務，在法界相當活躍，當選了上海律師公會理事長。同時，沈鈞儒也利用鄒韜奮的生活書店及其他刊物，撰文向市民廣為宣傳，並以「各界救國聯合會」名義發動學生罷課、請願，因而被捕下獄，此即左傾人士渲染的「七君子案」。七人被收押在蘇州監獄，但報端却天天有他們「起居注」的消息和圖片，如在獄中打太極拳、寫作詩詞。

左傾人士也真會把握機會宣傳，有一次時任監察院長的黨國元老于右任去拜訪其恩師沈衛（沈鈞儒的叔父），第二天報上就刊出一則新聞，捕風捉影，大打高空，說是于右任要為老師籌備



①

②不分前後排右起：馬敘倫（戴眼鏡）、林伯渠、毛澤東、黃炎培、郭沫若、陳其瑗、李濟琛、×××、朱德、沈鈞儒、×××。
 ①自右至左不分前後排：李公樸、王造時、馬相伯、沈鈞儒、鄒韜奮、史良、章乃器、沙千里、杜重遠合影。



②

祝壽，使得沈衛有口難辯，他對人說：「國家多難，我的姪兒又遭拘禁，那有心思做壽！」

沈鈞儒自離開浙江省政壇後，已受共黨思想感染，乃是不爭之事實；其為共黨馬前卒，大放厥詞，極盡為共黨宣傳之能事。民國二十七年全國以武漢為政治中心，各方愛國志士從四面八方而來，而一些投機取巧別具用心的傢伙也紛紛來到。在全國一致對外民族大團結的原則下，「七君子」已從監獄中放出來了，政府為表示團結的誠意，對他們相當禮遇，如聘沈鈞儒為國民參政員；可是他與李公樸、章乃器、史良等一如往昔，毫無悔意，不時把握機會為中共搖旗吶喊。沈鈞儒善用其自身的資本，因為他是沈衛的姪子，也是同盟會員，所以到處招搖。

忘記了孫中山遺囑

民國二十七年四月，武漢各界為響應國際反侵略大會，擬策動文化界領導示範先舉行大會；中共及其外圍份子一看機會來了，立即準備藉文化界舉行大會之際，展開為共黨宣傳。五月初，大會於漢口兩儀街上海電影院舉行，由張道藩擔任主席，會後遊行，陶滌亞為遊行總指揮，途經民權路國父孫中山先生銅像前，大家聚集肅立，向國父致敬獻花，主席團推沈鈞儒為臨時主席，他一看機會來了，這下子可有辦法為中共幫腔說話，胸有成竹，滿臉得意之色，以為獻花後就可表態一番，廣為共黨宣傳，他一聽：「主席就位！」就大搖大擺，得意忘形的走上了臺階。司儀接着高喊：「主席恭讀國父遺囑。」

這下猶如一聲霹靂，沈鈞儒呆若木鷄，站在原地不知所措，原先的那副得意形象已飛向九霄雲外，非常尷尬，因為他根本就不會背國父遺囑，也未料到司儀臨時添上這一招，於是只聽到羣衆中響起喊聲：「你一向自稱是同盟會會員，國父忠實信徒，連國父遺囑都不會背，你是什麼信徒，簡直是混進……」

臺下嘈嘈嚷嚷，那天的司儀也真够機靈聰明，恐弄得太僵也不好，立即拉開大嗓門喊道：「獻花！」

這一喊，結束了沈鈞儒的難堪場面，他此時只要能下得臺階就好了，那還有心思於獻花後再為中共幫腔講話。第二天，武漢各報都報導了這件新聞，沈鈞儒也因此確實「風光」了一陣。

沈鈞儒領袖慾很強，野心勃勃，國民參政員當然不能滿足他的慾望。民國三十年，他與張瀾、章伯鈞、黃炎培、羅隆基、鄒初民、史良等，在重慶組成「民主政團同盟」，三十四年十月改名「中國民主同盟」。三十五年元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，他是「民主同盟」的代表，參與協商會議，「民主同盟」初期尚有民、青兩黨人士參加，只是沈鈞儒和「救國會」的一批人，受中共統戰運用，讓共黨牽着鼻子走。

沈鈞儒一直「民主」、「民主」的喊得響徹雲霄，彷彿只有他才能真正代表民主；但他自三十七年九月從香港潛入共區後，便緊閉嘴巴，悶聲不吭。三十八年十月偽政權成立，沈鈞儒出任了中共的「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」兼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」、「最高人民法院

長」等職務。當時江南新陷，共幹到處搜刮，普遍展開清算鬭爭，地方仕紳受辱、受刑自殺、被殺的到處皆是，江南人民慘遭魚肉。

最高人民法院院長

褚輔成生前組織有全浙公會，設在上海愛文義路聯珠里，為地方公益及鄉親提供服務，於是推派一些與沈鈞儒有交情的到北京去，大家認為沈鈞儒既然位居中共高職，自然可以為地方說話。他們到了北京，直趨「最高人民法院」，經過一再盤問，才讓他們進入會客室，又過了兩個小時，一位「勤務員」才引他們進入「院長」辦公室。但見一間空洞洞的大房子，沈鈞儒孤零零的坐在一張大辦公桌後面，表情木然，兩眼似有驚懼之色。大家只是閒話一些家常，每接近正題，沈鈞儒都趕緊避開；因為一位表情嚴肅的「勤務員」就站在沈鈞儒的左後方，兩眼不時瞧瞧沈鈞儒，也瞟瞟訪客。到了中午吃飯的時間，那位「勤務員」去取飯，來訪的代表陳警先（原與沈鈞儒私交甚篤，陳為絲繭商，曾對沈不少經濟支助）猛然站了起來說道：「沈先生，現在江南的同鄉們都在水深火熱中，你坐在這裏無動於衷，你擔任這個如囚犯般的『院長』，有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唉！」沈鈞儒未開口先嘆了一口氣：「假使從前我們真正擁護政府，實行三民主義，怎麼會有今天這步田地呀！」也許沈鈞儒是真的良心發現，後悔當初處處與政府搗蛋，猛扯政府後腿；要不然就是遮羞話。這時，「勤務員」捧着一個飯盒走了進來，往桌子上一放，沈鈞儒站起來，

說：「吃中飯的時候到了，很抱歉我無法招待你們，你們請便吧！」「勤務員」像押解犯人般，將這幾位遠從上海來的浙江老鄉送出了「最高人民法院」大門。

不久，私立上海法學院人士也電請沈鈞儒南下，蒞校指導，這時沈早已看透中共蠻橫無理、兇狠多忌的真面目，稍一不慎，必喪命無疑，少惹事為妙。於是沈鈞儒置之不理，乾脆連電報也不同。

民國四十四年二月，張瀾病故；沈鈞儒接任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」，這時中共之外的其他黨團組織，已失去了運用的價值，只算是一種擺飾，點綴裝潢而已。沈鈞儒像個傀儡木偶，行屍走肉，落莫寡歡，苟延殘喘，到民國五十二年六月結束了他的一生，死時已九十一歲了。

胡適將馬攆出北大

馬敘倫初號彝初，後改夷初；生於光緒十年甲申（公元一八八四年），他的曾祖是個鞋匠，由紹興遷杭州。由於曾祖胼手創業，遂由鞋匠而成店主，有了經濟基礎，乃能培植他的祖父進入「士」的階級；但不知什麼原因，他的父親仍為布衣，非常失意。馬敘倫十歲時，他父親撒手西歸，由於其天資穎慧，又經其寡母苦心培育，先是隨師客讀，到了十四歲那年，才正式進入杭州養正書院，該院設有六個班級，相當於初、高中程度。馬敘倫每半年就能進一級，學識長進神速。他將畢業那年，學校發生風潮，他也被牽連

在內，於是遭到開除處分。在衆多同窗中，他和湯爾和、杜士珍結為異姓兄弟；進而結交求是書院蔣尊簋、蔣百里、許壽裳等。馬敘倫在養正書院求學期間，曾受教於名進士陳黻宸。

光緒三十二年，馬已二十二歲，這年陳黻宸出任設於廣州的兩廣方言學堂監督，馬敘倫得被聘為方言學堂、師範館教席；革命元老朱執信、林雲陔當時也是方言學堂的學生。宣統元年（公元一九〇九年），陳黻宸當選為浙江諮議局議長，又帶馬敘倫回杭州，並推介他出任兩級師範教席，以僅相當高中的學歷，如無真才實學，又怎能勝任相當大專院校的教席，證明馬敘倫學識根基深厚，足以勝任，受陳黻宸特識擢拔。民國二年，湯爾和創辦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，邀請他擔任國文專任教席。當陳黻宸執教於北京大學，民國四年之際，馬敘倫也受聘在北大文學院講課。民國五年九月，他向湯爾和建議，請蔡子民（元培）回國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——原任校長胡仁源無法繼續職務，並曾草擬一份革新北大的計劃書，交予湯爾和。湯第二天就跑去見教育總長范源廉，說明情形。范總長看過革新計劃後，說：「好，就這樣決定，我馬上拍發電報，邀請蔡先生回國好了！」范總長停了一下繼續說：「不過，這是大事，我還是應該報告黎大總統的。」過不了多久，就正式發表蔡元培為北大校長。民國八年「五四」運動發生後，蔡元培離開了北京，北大組成「教職員會」，公推康寶忠擔任主席，馬敘倫為總幹事；不久，康寶忠因心臟病去世，改由馬敘倫任主席，沈士遠為總幹事，在蔡元培

離校的這段期間，就是由「教職員會」負責實際推行校務的。

「五四」運動像陣狂飈，等到風平浪靜，蔡仍滯留紹興老家，沒有回北大的打算，而且電報湯爾和，請辭北大校長一職。這時湯爾和找到馬敘倫說：「蔡先生要辭掉北大校長，你看怎麼辦？」馬敘倫望了湯爾和一眼，沒有表示意見。「蔡先生辭去北大校長，損失很大，像他這樣有聲望、有學問的人實在不多！」

馬敘倫微笑點了點頭，仍舊沒開腔。「你怎麼不講話呀？」湯爾和憋不住，直瞪着馬敘倫說。「我講什麼話，我又不當教育總長，掌權的應該自己拿主張呀！」兩人私交甚篤，所以也就直來直往。

一段沉悶過後，湯爾和想出了主張：「我想起來了，蔡先生不是有個學生蔣夢麟，現任職江蘇教育會，是蔡的得意門生，何不請他到北大來代表蔡先生辦事，豈不美哉！」

當時教育界門戶之見很深，有地盤觀念、小圈子思想；北大不少人士害怕江蘇教育會來搶北大的地盤，因而對蔣夢麟有很大的排斥感，馬敘倫多方奔走，代為疏通，總算平靜下來。

蔣夢麟在出席北大教職員會時，態度和藹，非常謙恭的說：「蔡先生派我來捺『印子』的，一切都還要請各位從中幫忙……。」此後，凡是蔡元培不在北大時，校務就由蔣夢麟全權代理。

馬敘倫骨子裏還是熱中功利的，一有做官的機會，他絕不放棄；無官可做，就回北大。他認為他對北大有安定的力量，北大也等於他的家；

就因為這樣，平時倚老賣老，什麼事都要揀上一手。直至民國二十五年，還在學校鼓動學潮，那時胡適已當上了北大校長，實在看不慣他的作風，於是在學校的評議會提出，經評議決定：「馬敘倫請假一年。」這項評議決定，等於是趕他走路，實在大傷顏面。

陰狠毒辣故舊不容

前文提到馬敘倫熱中做官，茲舉例以證。民國十一年夏，浙江省教育廳長夏敬觀請辭，北大出身的秘書許寶駒去到北京，和蔡元培及浙江旅京的教育界人士交換意見，決定推舉馬敘倫繼任，於是透過李大釗向教育次長全紹清說項，因而馬敘倫得回浙江出任教育廳長。同年，北京政府國務院改組，湯爾和任教育總長，發表馬敘倫為教育次長，張宗祥為浙江省教育廳長。所以馬敘倫在浙江教育廳任職不到半年。當時軍閥割據，政治極不穩定，他第一次任官僅四個月而已，不過曾一度代理部務，非常風光。民國十三年黃郛攝政，易培基為教育部長，馬敘倫續管活動，得李石曾推薦，第二度當上教育次長，也曾一度代理部務。民國十六年北伐軍克復南京後，全面清黨，這時馬敘倫是浙江省政府委員，誣陷代主席褚輔成和秘書長沈鈞儒兩人繫獄數十日；浙江省政府改組，馬敘倫以省府常務委員兼長民政。民國十七年蔣夢麟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，發表他為教育部次長。由於他工於心計，長袖善舞，他在北洋政府及國民政府治下，兩任省府廳長、三任中央教育部次長，且曾兩度代理教育部長，雖

為時短暫，但總算過了官癮。

談到馬敘倫的陰狠毒辣，不容故舊，民國十年間的一段往事不可不提。民國十年，素有江南「思想搖籃」之稱的杭州第一師範，因前一年有位學生施存統發表「非孝」一文，震驚了社會，引起廣大的攻擊；校長經亨頤引咎辭職，由姜琦接替。當時北大以「教授」治校聞名，而浙江一師却因「學生自治」廣為教育界矚目；因之，一師校長形同木偶。姜琦任職不久，借赴美名義堅決請辭。就在這時，馬敘倫在北方鼓動學生風潮，也廣為國人所知；他回到杭州，教育廳長夏敬觀要他接長一師，他欣然同意。時杭州一中校長黃人望也是工於心計之輩，於是二人狼狽為奸，控制了省教育會，使教育界人士都受他倆掌握。於是社會上送給他倆一個綽號——「馬蟻黨」（原來江南人誤水蛭為馬蟻，以其形環體軟，有吸盤，附着人體吸血，狀極可怖）。當時蔣夢麟和他們時有來往，一般好事之徒遂譏之為「蔣腿」。緣金華火腿遠近聞名，以蔣姓製者為上品，故杭州火腿莊多以「蔣腿」為市招，真是諷而又虐。當民國十六年浙江省政府改組後，由張人傑主政，張除注重建設事項外，其餘政務全交由馬敘倫代行，張的私章也由他保管，真正是大權獨攬，如日中天。那時陳布雷是省府秘書長，以陳的恢宏氣度，在日記上還記着：「……被任為浙省秘書長，赴杭就事，寓貝莊，旋以常務委員（當時省府有三位常委，除主席為當然常委外，其餘兩位常委為秘書長、民政廳長）馬彥初君專擅，不喜其所為……遂於五月下旬辭職赴京。」

馬敘倫在他的「我在六十歲回憶」一書中，有如下之記述：「……邵元沖任杭州市長，秘書長換了陳布雷，又辭職了，由許寶駒繼任。……」

三次被毆鼻青臉腫

本來馬敘倫的本意就是希望陳布雷辭職，正好推薦關係密切的北大學生許寶駒，如此「馬蟻黨」的力量就更壯大了；然而，政壇變幻莫測，那知寧漢分裂，蔣總司令中正於八月十二日引退，省主席張人傑跟着辭職，周鳳波上臺。杭州市報紙刊出大量抨擊馬敘倫的文字，說他專橫狠毒不容故舊，大家一起來打倒「六畜」，除馬敘倫外，尚有蔡元培、蔣夢麟、邵元沖、陳希豪、許寶駒等。以上五人，馬敘倫或借重他們的地位名望，或是來往密切，以當時青年看來，他們都是高級知識份子，而且像蔡元培、邵元沖、蔣夢麟且居於受崇拜的地位。攻擊馬敘倫最烈的一份報紙是杭州商報，發行人為許祖謙（行彬）。許在省議會反對北洋軍人最力。民國十五年孫傳芳盤據江浙時期，許祖謙聽說孫傳芳要撤換浙江省長夏超，他便在報端披露「夏超調職」的傳聞，於是引起杭州各界的挽留；使得孫大帥怒氣沖天，火冒三丈，以「造謠煽動」的罪名將許祖謙打入大牢，計劃處以極刑；此事幸經當時杭州商會會長王竹齋從中斡旋轉圜，並以自個身家性命力保，許祖謙的一條老命才得保住。這時反對「馬蟻黨」的仍是一些以前反對北洋軍閥的人士，他們同樣看不慣馬敘倫的作風，許祖謙就是其中之一。

馬絨倫第三次出任教育部次長，在自述中說：「人家說我被打倒，不過說我丟了官，我就再做一次官給他們看看。」馬絨倫活動頗有其獨到之處，然而他一意孤行，以致到了民國二十五年，蔣夢麟也疏遠了他。馬絨倫在北大是講授老莊哲學課程的，但其本人却毫無超然獨特的氣質，功利思想濃厚，滿腦子「領袖慾」；為官時攬權專橫，下臺後走偏鋒，搞羣衆運動。

民國十年六月三日，馬絨倫在北京以「八校教職員會聯合會主席」的名義，率領了數千人，浩浩蕩蕩的到了教育部門口，請馬代部長帶頭到總統府向徐世昌索薪。等他們到了總統府前，新華門已關閉，並佈置了軍警；等羣衆一到，就被攔住，如果硬闖，立即開槍。那天他走在前面，沒被子彈打傷，但同沈士遠一樣被揍得鼻青臉腫，當天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。暑假過後，學校要開學了，由汪大燮、孫寶琦、王芝祥等出面轉圜，才算結束這件公案。馬絨倫十分自大，常自誇「六三」規模較「五四」尤大。

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北京的學生、工人發動示威遊行，在天安門宣佈段祺瑞的罪狀，馬被推選為主席團之一；在遊行歷程中，搗毀幾處段系要人住宅，還燒了晨報報館。過了幾天，又計劃要在天安門集合，發動更大的行動，北大學生從第三院出發，馬絨倫有以下記述：

「……我和朱家驊各領一隊，正要出去，大門已被封鎖，回頭向邊門走，這時我反成了「殿後」，而且已離開了隊伍，不想邊門也有警察，幸是少數；走得快的都衝了出去，我剛要走出，

被警察飛起一脚，正踢中我的鼻嘴，頓時麻木了。」這是馬絨倫第二次被毆。

民國十五年「三一八」慘案發生，馬絨倫自稱是此案的參謀長；後來北京政府發出通緝令，他只好躲進東交民巷，不久風聲放鬆，他才悄悄南下回到杭州。抗戰時，馬絨倫住在上海租界。勝利之後，全國組織風大盛，馬絨倫也不甘寂寞，為求滿足「領袖慾」，又和幾個「馬蟻黨」之流，共同組成「中國民主促進會」。民國三十五年五月，中共「新四軍」盤據蘇北，搞得亂哄哄的，大批後方還鄉的人無法回家安居。別具用心的馬絨倫這時却在南京下關大放厥詞，為中共張目，反對國軍武力收復蘇北，遂引起大批流亡同胞憤慨，報以老拳。馬絨倫時年六十三，鼻青臉腫，狼狽不堪，算來這是他第三次被毆。當時左傾份子擬仿效抗戰前「七君子」案，以「下關事件」煽動羣衆，製造輿論，困擾政府。不久，由於中共到處引發戰火，野心暴露，事實證明中共的罪行，馬絨倫的「下關事件」自然沒人再提了。

聯袂投共坐冷板凳

早已受中共蠱惑的馬絨倫，於民國三十七年向中共靠攏，當上了「政務院政務委員」、「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高等教育部部长」，都是虛有其名，如同木偶，毫無實權。和沈鈞儒一樣，不但朝夕坐冷板凳，而且一舉一動都受「勤務員」的監視控制；這時雖悔不當初，但亦無可奈何了。

馬絨倫素倚老賣老，自我推銷，提昇形象

在他的記述中諸如：「為北大蔡校長安排人事，找陳仲甫（獨秀）主文學院……」、「……我和毛澤東的老上司李大釗交情深厚……」、「……回到北京，青年學生益發集中到我的身邊……」、「……第二次代表大會時，我無法分身，就推了張國燾……」，這些語句被一向有自大狂的毛澤東看到自是不悅，又怎麼會喜歡他、重用他？至馬寅初（兩人於民國十六年同為浙江省政府委員）在北大校長任內被中共批鬥後，他更膽戰心寒，驚恐不已，每日如待決之囚。如此身心痛苦的生活，直到民國五十九年五月病死北平，時年八十七歲。所幸抗戰時他居住在上海租界，沒有從事政治活動，所以請北大老友中央研究院負責人蔡元培、朱家驊補助研究費，從事整理在北大授課時的講義，完成「列子偽書考」、「說文解字研究法」、「莊子義證」等三部著作。沈鈞儒與馬絨倫二人，先天稟賦均甚優異，機遇亦佳，清末民初即嶄露頭角，若循正途發展，當有輝煌成就，惜因「領袖慾」、「權力慾」太濃，對人勾心鬪角，處事喜走偏鋒，以致晚節不保，做了禍國者的幫兇，言之令人扼腕嘆息。

訂閱中外雜誌、購買合訂本及中外文庫、中外叢書，請撥電話五〇八四二〇六，五〇六五三一，即可收到書刊。